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

浙江

浙江城镇发展史

Zhejiang Chengzhen Fazhanshi

陈国灿 著

山

杭州出版社

浙江城镇发展史

陈国灿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城市发展史/陈国灿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80758 - 165 - 9

I. 浙... II. 陈... III. 城镇—发展史—浙江省
IV. 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13 号

浙江城市发展史

陈国灿 著

本册责编 丁国志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 310007 电话:0571 - 87997719
制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4
字数 615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758 - 165 - 9
定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

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

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学科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绪论 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一节 城镇是什么

一、城镇是与乡村相对应的社会体系

研究城镇史,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城镇的问题。对此,人们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城镇往往是小型城市或城区的代名词,用以泛指大中城市周边和乡村地区兴起的各种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中心和居民生活区。如美国于1968年通过《新城镇开发法》后,第一批建成的63个新城镇,人口规模大多在2万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全国有8000多个城镇,分布于各地农村,平均每个城镇约7000人。^①

就我国而言,城镇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其具体所指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环境下并不相同,有时是城市和镇的统称,有时是泛指城市,有时是指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体,即所谓的小城镇。此外,还有行政管理中所规定的城镇,其含义不仅与一般所说的城镇有所不同,而且随着行政体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县治所在地为“城”,县以下人口满5万人的乡为“镇”。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将设市城市从一般地方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单独编制。1955年11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城镇划分为城市和集镇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的市区,以及常住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工商业区域;后者是指县级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其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且居民50%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区域。从20世纪80年初开始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地市合并、撤县设市、并乡建镇的调整工作,市成为省、地、县三

^① 冯华:《国外的乡村城市化》,载《村镇建设》1989年第3期。

级行政单位,其管辖范围包括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镇成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元,包括镇区和辖区内的农村。基于城镇管理体制的新变化,2006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将城镇界定为城区和镇区两部分。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划定的区域,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镇和其他区域中划定的区域,包括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

那么,到底该如何对城镇进行适当地界定呢?从理论上讲,城镇作为与乡村相对应的社会学概念,是对人口构成、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乡村有所区别的各种社会实体的统称。在具体形式上,城镇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主要有城市和市镇(镇)两种基本形式。其中,城市一般具有较完整的社会结构和活动特征,市镇则属于城乡之间的过渡形态,兼具城乡社会的部分特征。本书所说的“城镇”,就是指由城市和市镇构成的社会体系。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

其一,我国古代城市大多是以各级政治中心地为依托发展起来,市镇则广泛兴起于乡村地区。尽管部分政治中心地——主要是发展规模和水平相对有限的县城——严格地说并不具有完整的城市形态,但考虑到古代城市的政治特性,人们习惯上还是将这些政治中心地归入传统城市体系之中。

其二,传统市镇作为农村工商业聚集地,在具体形式上又有市与镇的区别。这种区分既表现为规模上的差异,如康熙《嘉定县志》卷1所说:“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也反映在商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所说:“市与镇之别,前者无标准,大抵沿用早时之习惯、名称,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还表现为社会职能上的差异,如康熙《青浦县志》卷2所说:“市者事也,民各事其事;镇者,民之望也”。但市与镇的区别是相对的。事实上,早在市镇开始兴起的两宋时期,市(当时一般称草市)和镇就不是绝对固定的,草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上升为镇,镇如果工商业走向衰落则会降为市。同时,部分草市虽没有升置为镇,但其规模和影响并不逊色于镇,有的超过了那些所谓的“大镇”、“巨镇”。如南宋后期,临安府浙江省的年商税额高达8万多贯,^①其商品交易和流通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一般的府州城市。到明清时期,市与镇的区别进一步趋于模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常常将两者视为一体。正如

^① 潘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9《商税》。

弘治《湖州府志》卷4所指出的：“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

其三，进入20世纪，随着城镇设置的进一步行政化，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城镇体系：一种是基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体、以工商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和市镇（集镇）；另一种是基于行政管理需要而划定的城区和镇区。就前者而言，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镇与乡村的界线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乡村被纳入到城镇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活动体系之中；就后者而言，虽然城乡之间在行政区划上仍有着明确的界线，但城镇的多层次扩张以及在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起，促使城区和镇区的管理范围呈不断扩大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掀起的设市建镇热潮，表面上看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种调整，其实质是基于现代化要求和城镇发展的新特点，运用行政手段来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各种建制市和建制镇的设置，表明城区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而是包括日趋城市化的广大农村；镇区也不再只是镇级行政辖域内孤立的街区，而是与周边农村形成了多层次的密切联系。因此，探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中国城镇的发展，对上述两种城镇体系都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二、城镇是特定的社会中心形式

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城镇，还应该弄清其本质属性和社会意义。这方面，需要就城市和市镇分别加以讨论。

有关城市的社会性质和特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认识。社会学家认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更是人类属性的产物”。^① 城市有着与乡村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具有“聚合容器”作用的社会综合体，“可以使许多不同的要素在容器中相互作用，并产生出新的要素”。^② 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应该是非农业人口集中，以从事工业、商业、交通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居民点”，^③ 是非农产业和市场活动高度集中的产物。“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带来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使城市地区经济活动的成本

① R. E. 帕克、E. W. 伯吉斯、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 王颖：《城市社会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③ 宋家泰等：《城市总体规划》，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得以节省,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大幅度提高”。^① 人口学家认为,“城市是有一定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② 因此,人口聚居的数量、规模,以及其中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是界定城市的重要指标。地理学家认为,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特定空间结构,“是具有中心功能的区域焦点”。^③ 系统论者认为,“所谓城市,就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利用和自然环境自用为特点,以集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的,集约人口、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空间地域大系统”;“城市既是多种建筑形式的空间组合,又是占据这一组合的结构并不断地与之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联系、各种社会团体、企业、机构等等在时间上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④

显然,上述不同学科的解释都只是针对城市的某一侧面提出的,揭示的是城市的某种特性。美国著名城市建筑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力图跳出单一学科的视野,从宏观角度对城市作综合性说明。在谈到“城市是什么”的问题时,他从九方面概括了城市的特性:(1)“城市是人们积极的聚集行动发生的场所”; (2)“城市总是集群出现”; (3)“城市具有某种物质上的,或者象征意义上的形态界限,这个界限将城市性与非城市性区分开来”; (4)“城市内有明确的劳动分工”; (5)“城市是一个有利于获取利益的地方”; (6)“城市必须依靠文字记录”; (7)“城市与乡村有着紧密的联系,必须有一片相应的地域一方面供养城市,另一方面又为城市提供保护与其他服务”; (8)“城市带有某种形式的纪念寓意,这使它们与其他地方相区别”; (9)“城市是由建筑和人组成的场所”。^⑤ 另一位美国城市学者凯文·林奇也以相同的思路对城市作了多角度的解释:其一,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二,城市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共生体;其三,城市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地方;其四,城市是一种社会的场;其五,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决策的产物;其六,城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地方。^⑥

其实,无论是人口的高度集中和非农业经济的聚集,还是与乡村不同的社

^① 成德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② 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③ 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④ 张文和、孙选中:《城市定义研究》,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⑤ 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0页。

^⑥ 转引自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会形态与空间结构,抑或活动方式上的特殊性,都只是城市的外在属性和表现形式。正如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指出的:“密集,众多,包围成圈的城墙,这些只是城市的偶然性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特征。”^①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和分析中外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便可以发现,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具体发展形态和特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这就是:城市充当着社会中心的角色。事实上,城市正是以社会中心的形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城市起源的问题时说,探讨城市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其最早形态,不论这些形态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距离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有多么遥远。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②这里,刘易斯·芒福德主要从人的动物本性来解释早期人类群居生活的出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始的从村落到城堡再到城市的演进过程,其中固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忽视了人类特有的社会性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如果说动物性使得早期人类走向自然的群居生活,那么社会性则使人类的群居生活由本能欲望上升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超自然活动——但也揭示了城市是由人类群居生活引发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一最基本的性质。而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其作为社会中心的本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

社会中心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聚落,甚至聚落中的公共活动场所,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中心的意义。但城市作为社会中心有其独特性,具体可从三方面来看:

首先,城市是多种因素结合于一体的社会聚合中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 E. 帕克指出,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习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③确实,城市不仅包含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地理、自然等因素,更是这些因素多层次、多结构的聚合体系。借用系统论学者的说法,城市是一个“空间地域大系统”。在

^① 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② 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2页。

^③ R. E. 帕克、E. W. 伯吉斯、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第1页。

城市活动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是以自身原本的状态存在的,而是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存在的。人口的聚集在村落里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组合,在城市里则是有着复杂的地域背景、多样化的职业和身份、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流动性群体;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聚集在乡村表现为单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文化的集中,在城市里则是有着高度分工的产业体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其次,城市是多功能的社会控制中心。从历史上最初诞生的城堡式城市,到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一直是各种社会控制力量的集聚体,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城市发挥控制功能的重点和形式有所差异而已。在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控制中心,通过覆盖乡村的行政网络和军事力量的聚集,实现对乡村的统治。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城市进一步成为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控制中心,其控制范围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产业、金融、市场、信息、技术、文化、生活等领域。

再次,城市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融合中心。各种文化因素向城市的集中,并不只是简单的组合,而是在互相交流、融合、冲突的基础上孕育新文化形式的过程。一种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但也缺乏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城市的开放性、多元性和流动性,不仅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多种文化聚集所引发的竞争和融合关系促使每种文化注意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更重要的是,它推动文化之间不断地重组和升级,这也正是创造新文化的基础。就此而言,城市可以说是具有文化创造性和保存作用的“聚合容器”。“所谓容器,既是指对异质性人群的聚合和容纳,也是指为各种文化交流、创新、发展、留存等提供场所。城市就是这样一种聚合容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仍然是。不同的只是过去、现在、将来,城市这个容器所包容的内容有所不同。”^①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城市又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刻。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吉斯特和费瓦指出:“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②城市是在农村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但城市又超越了农业经济和乡村文明,逐渐确立起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而越来越成为社会文明体系和价值趋向的主导力量。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城市

^① 王颖:《城市社会学》,第15—16页。

^② 转引自崔功豪主编:《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化浪潮的出现,便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

城市是多样性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城市发展形态和道路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同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从中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来看,一方面,西方古代城市居民最初对城市守护神的崇拜,最终演化出以个人为主体、以法制为纽带的城市社会结构;中国古代都城统治者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最终演化出以群体为核心、以伦理为纽带的城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西方城市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具有商业文明的特性,中世纪以后更是走上城乡分离和对立的道路;中国城市一开始就是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权力中心,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使城市在政治上控制农村,在经济上依赖农村。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传统城市的兴衰,首先决定于政治的变动;而近现代以来城市的兴衰,则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经济因素。从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发展的特点来看,北方城市由于长期处于政治核心辐射圈内,较多地呈现出“循规蹈矩”的特性;南方的城市因远离政治核心,较多地具有“因时而变”的特性。

城市是多层次和多类型的。从空间规模来看,有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等不同层次;从发展形态来看,有政治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港口城市等不同形式;从功能和影响力来看,有国际性城市、跨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方中心城市、中心小城市等不同级别。我国的城市地域结构体系,同政治的空间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少情况下两者甚至是重叠的。

与城市一样,市镇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社会中心形式。但相对于城市,市镇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国市镇的兴起、发展、演变,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尽管在历史上市镇的出现较城市要晚得多,其正式确立和广泛兴起始于宋代,但在发展势头 上较城市要迅猛得多。全国各地的市镇数量,两宋时期在 3600 个以上,清代中后期超过了 1 万个,21 世纪初更增至近 2 万个。

从表面上看,市镇最初大都是以农村集市和商业活动点的形式出现的,进而发展为乡村工商业中心地,但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其意义并不只限于商业领域,而是影响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就农村经济而言,市镇不仅集聚了周边乡村的商业活动,而且以密集的分布网络,使市场活动渗透到农村各个角落,并将原本零散、孤立的乡村交易活动组织起来,构成了多层次的农村市场体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朝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进入现当代,市镇又成为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和发展载体。就农村社会而言,市镇的发展过程,也是乡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作为工商业中心地,市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其居民在职业和社会身份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出与一般乡村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生活。在此